

04.08

左权文史资料

政协左权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三 期
1985年2月20日



按：欧致富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他率领全团指战员转战在太行山区，英勇作战，功勋卓著，老幼妇孺皆知。当时辽县人民群众都以敬仰的心情称八路军总部警卫团为“欧团”，哪里有硬仗，哪里就有欧团；哪里有攻坚战，哪里就有欧团。一听说欧团上了前线，人民欢欣鼓舞，充满胜利信心；一听说欧团投入战斗，敌人闻讯丧胆，望风披靡。《在辽县战斗的日子里》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下旬他为左权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写的一篇稿件。这是一篇极其珍贵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经我会征得本人同意，在这里发表。在此，特向左权人民敬爱的老团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左权文史资料》从本期起，将陆续刊载抗日战争回忆录和抗日英雄，模范人物传，我们殷切地希望当年工作、战斗在辽县的老首长、老领导、老八路、老同志们踊跃赐稿。

在辽县战斗的日子里

欧 致 富

辽县（今左权县）是老革命根据地，是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抗战期间，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行区党委、一二九师师部等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长期驻在辽县。朱德、彭德怀、左权、邓小平、刘伯承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那里生活、工作和战斗，踏遍了辽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留下了许许多多永远鼓舞人们奋发向前的革命足迹。

我从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至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奉命南下，抗战八年，一直在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工作，转战在辽阔的太行山区，而在辽县所度过的战斗岁月，尤其使我难以忘怀。那是因为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我们曾和英雄的辽县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永远载入史册的革命篇章。前不久，我曾收到左权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来函，要我回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由于时间仓促，我只写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间关于黄崖洞（水腰兵工厂）保卫战的一些材料。现在我想根据自己的经历，再补充谈一些。由于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有的可能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希望当年曾在辽县生活和战斗过的老八路、老同志帮助回忆，共同搞好辽县即左权县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一、奇袭红都炮台

一九四〇年十月，敌人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毁灭性扫荡”，扬言要把我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剿尽杀绝。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我八路军总部发起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十月下旬，总部经武乡拴马、宋家庄及蟠龙，第三次进驻砖壁村。我们警卫团仍留在蟠龙地区担任警戒。为了配合一二九师破击正太铁路，阻击辽县、武乡外出扫荡的敌人。警卫团奉命破坏辽县通向榆社的公路桥梁，以及对辽县外围据点进行牵

制和骚扰。参加这次反扫荡行动的，除了我警卫团一营和三营外，还有辽县、武乡的民兵、民伕兵一千人左右。为了统一行动，左权参谋长要我负责指挥这次战斗。

记得天刚亮，我们的队伍便从蟠龙镇出发。根据我们事前的侦察，在辽县和榆社之间，有一座大山，叫红都炮台。这是敌人的据点，驻有约两个排的日军和伪军，监护着榆辽公路。他们白天沿公路巡逻，设置重重岗哨，封锁非常严密，连普通老百姓过路也受搜身检查。晚上，据点上的探照灯通夜不灭，把东西方向数里内的公路照得如同白天，稍有动静，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同时，离辽县二、三里地的公路边，也设有敌人一个外围据点——七里店，和红都炮台互相策应，把两个据点之间的公路防守得严严实实。只要一有情况，敌人马上就可以同时配合行动，因此，要想破坏敌人公路，必须除掉这两只“拦路虎”。经研究，我们决定夜间行动，采取奇袭的战法，出其不意，对这两个据点同时下手，坚决拔掉它。具体部署：一营负责对付红都炮台，三营打辽县外围据点。辽县游击队在队长左奎元同志带领下随一营行动，武乡民兵随三营行动。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又派一个连的兵力悄悄隐蔽在辽县城外附近，准备阻击城外出动的敌人，掩护夺取据点战斗。

午夜时分，部队同时进入了各预定地点后，立即开始行动。

一营在辽县游击队同志的带路下，很快摸到了红都炮台山脚附近的一片庄稼地里。可是，再往前走却是一片开阔地带，而敌人的探照灯在来回不停地扫射，大部队要想穿过很困难。万一被发现，就会影响整个战斗的顺利进行。一营长魏传连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就地隐蔽，并作出歼灭山上炮楼的方向。当时决定，派出小分队摸上山去，先让敌人探照灯干掉，然后由上山山下策应，一举歼灭敌人。

左奎元同志是本地人，地形熟悉，他自信奋勇率领小分队完成任务。趁着敌人探照灯明灭交替的空隙，小分队象夜老虎般迅速跃过开阔地，向山上敌人炮楼逼近。山上到处是敌人的流动哨所，象一条条鬼影似的来回游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躲过几处流动哨之后，眼看离岗楼只有几百米，已经看得见岗楼上敌人晃动探照灯的情景。就在这时，一个同志不小心踩动了石头，发出了“咕噜咕噜”滚动的声响，惊动了附近的流动哨兵。

“谁？”是个伪军在喝问，并朝响处畏畏缩缩走过来。

同志们心里都捏着一把汗，要是被敌人发现，不仅完不成任务，连今夜整个大部队的战斗行动计划也会遭到破坏。这时，只见左奎元同志机智勇敢地大步朝敌人哨兵走去，边走边操着本地口音骂咧起来：

“他娘的×！摔得老子好疼哪！”

“你是谁？站住！”敌哨兵虽然胆小如鼠，然而狡猾透顶。

“真瞎了你娘的狗眼，连你大哥都认不出来了。”左奎元步步紧逼到哨兵跟前。

“你是——”唰的一声，哨兵打开了手电。

说时迟，那时快，左奎元一个箭步冲上去照准哨兵的下巴就是狠狠一拳。哨兵连粗气也来不及出一口，便“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同志们正要上前行动，冷不防迎面又走来了一个敌人。嘴里还“哥呀妹呀”地哼哼着，大概是来换哨的。来的正好，干他一双！还不等敌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早已冲到他眼前，七手八脚，干净利索地把他报销了。

不一会儿，只听“叭、叭、叭”三声枪响，敌人的三盏探照灯几乎同时瞎了眼，四野一片黑咕隆冬，敌人立即陷入混乱之中。叫喊声、骂声、鬼子叽哩呱啦的说话声，吵吵嚷嚷，就象一群被捅了巢穴嗡嗡叫的蜜蜂。敌人很快就醒悟过来，知道是遭到夜袭，拼命地胡乱朝山下开枪扫射，放照明弹。然而，就在敌人探照灯打灭后的瞬间，我山下的同志早已分东西南三路迅速地扑向山上。由于我们事先把上山的通道和敌人火力工事侦察得清清楚楚，又有辽县游击队同志领路和配合作战，加上小分队在山上互相呼应，所以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小时，敌人全部被我消灭。

在红都炮台战斗快要结束时，另一股敌人据点的方向上空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这是我事先与三营长钟玉山商量好的联络信号，说明那里的战斗也打得相当漂亮，已拿下了据点。战斗过程中，龟缩在辽县城里的敌人由于不明情况，害怕遭到我大部队的夜袭，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据点一拔除，我们立即连夜进行破击公路。我们采取分段包干的办法，一营就地从红都炮台开始，辽县、武乡的民兵民伕接着一营、三营从辽县的外围据点往西，各负责十公里左右的路段。同志们在战斗胜利的鼓舞下，情绪高涨，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摸黑奋战。大家利用锄头、镐头、铁锹沿公路又挖又刨，又敲又打，把公路弄得坑坑洼

注，支离破碎。由于我军密切配合，只用两天晚上，就破击长达三四十公里的路段，拆毁了三座大桥，使辽县和榆社两城敌人的交通陷入瘫痪，也切断了辽县敌人与西太路的交通联系。

这次战斗，我们共打死日伪军四十多人，俘虏十多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轻机枪一挺，我伤亡十余人。第三天黄昏，我们才乘夜幕撤兵回来。

二、武军寺伏击战

红都炮台战斗后，十月二十九日，日军三十六师团和混成第十四旅团共一万余人，立即对我武乡、辽县根据地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敌三十六师团一部从辽县出发，经桐峪到麻田。当时我八路军总部刚进驻麻田武军寺不久。很显然，敌人这次报复性扫荡是想南北合击，撒网捉“大鱼”，寻机消灭我八路军总部机构。

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总部决定进行一次小规模伏击战，让敌人尝尝我八路军铁拳头的厉害。经研究，由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迎接黎城方向敌人；我总部警卫团负责阻击辽县城里方向来敌。由于麻田离辽县城只有几十里地，和敌人相距太近，总部决定暂时向南、北艾铺一带山区转移。警卫团二营掩护总部行动，一、三营留下参加战斗。总部转移前，左权参谋长专门带领我们几个团领导干部去观察地形，选择伏击地点。我们按照左权参谋长的指示，决定从武军寺到桐峪之间的一条峡谷地设伏。这里地势很好，两边都是高山，中间是沟沟，沟旁有条小河，周围光秃秃，没有多少杂丛树木之类掩蔽物。而且我军居高临下，既可大量杀伤敌人，又可退守自如。战斗从早晨开始打响。当时，由于我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深得民心，群众经常主动为我们报信、带路等。所以当辽县三十六师团的日军从城里一出发，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原来，负责担任警戒的辽县民兵，早已事先埋伏在离城不远的一处山口，待敌人走近了，就“辟辟啪啪”打起枪，扔手榴弹。一是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二是作通报报信的暗号。所以，一听到枪声，我们就立即进入临时构筑的工事，严阵以待。一营由营长魏传连带领隐蔽在西边山头阵地，三营由营长钟玉山带领在东边阵地潜伏，二营是我的“老窝”，我跟随他们一起行动。

太阳懒洋洋地爬有竹竿高，敌人就出现了。我用望远镜观察，足有五、六千人。灰

黄军装，加上扬起的尘土也是灰黄色的，队伍真象一股浊流在山沟里流动。敌人很狡猾，过了桐峪，改成单兵队形前进，恐遭我伏击被一举歼灭。幸好峡谷很长，敌人完全进入我伏击圈少说也有一、二百人，只要我尽量减少伤亡，打个便宜仗没有问题。眼看敌人快进入峡谷地带了，可是，突然队伍停了下来，并用小钢炮不断向沟两边山地轰击，炮弹纷纷落在我们阵地的附近。莫非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动静？不可能。那为什么无目的地打炮呢？我正想着，山脚下传来日寇匪兵的乱叫乱嚷：

“八路的，有本事的出来！”

“八路的大大的胆小，逃跑逃跑的有，追啊！”

……

顿时我明白了，原来敌人狡猾透顶，看见这一带地势险峻，估计有埋伏，故意开炮试探引诱我开炮射击，好捕捉我方火力目标。我传令部队继续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果然，敌人看看没有动静，又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开始往我们的伏击圈里钻。一个、二个、三个……十个、二十、三十……我一直点着敌人的狗头数到一百。又过了几分钟，是火候了，我一声令下：“打”！刹时，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从峡谷四面响起，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喊乱叫。敌人在低处明处，被动挨打；我军在高处暗处，两边夹击。所以战斗一开始打得真痛快。只见日军叽呱乱叫，成排成排倒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及至明白过来时，已死伤二、三百人，尸体满地。然而敌人很快醒悟过来。一个留着仁丹胡子的日本军官，举着指挥刀，命令士兵开枪开炮射击，拼命督战。敌人毕竟人多枪多，武器精良，一会儿就平静下来，开始向我反攻。他们集中小钢炮、轻重机枪作掩护，兵分多路向我两边山头阵地同时扑来，战斗渐趋激化。敌人冲锋一次，我方就打退一次；打退一次，敌人又冲锋一次。双方如此来回拉锯，相持到下午，我方逐渐有所伤亡，主要是被敌人小钢炮所击中。

辽县地方游击队也参加了战斗，负责抬伤员、送弹药、送饭等。记得松树坪有个刘区长也来了。游击队同志人人勇敢机灵，行动迅速，及时地把我五十多名伤员和牺牲的同志抬下阵地，安顿和掩埋好。黄昏时分，我考虑到敌人被我狠狠揍了一顿，损失相当严重（共击毙近四百人），对我们来说已经够本了，而且我弹药越来越少，不利恋战；再说总部经一天一夜的行动，也已转移到安全地带；所以，在打退敌人又一次冲击之后，我军迅速撤出阵地，追赶总部队伍。敌人激战一天，连连损兵折将，什么也捞不

着，一气之下，冲进麻田镇，放火烧房子，在武军寺把总部曾住过的大庙也烧毁了。但是，敌人扫荡一结束，前脚刚走，我们后脚又回来了。没有几天，搬到山上的老百姓也陆续回来，重整家园，麻田又有了生气。

三、“麻雀”战术

一九四一年五月间，日军出动一两千人，对我辽东地区进行扫荡。我总部警卫团奉命在桐峪、麻田一带牵制，打击敌人，配合辽县武装民兵的反扫荡斗争。在左奎元同志的领导下，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麻雀战、地雷战和地道战。不仅使敌人毫无收获，而且处处挨打，连遭损失。在拐儿镇、松树坪、王家峪等地区，我英勇的民兵奋起还击，消灭了好几十名日军，缴获一批枪弹。我警卫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则在麻田、桐峪一带山地，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积极配合。我军战士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有时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有时突然出现在后方捅屁股，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团团乱转，处处碰壁，弄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

有一队日军，大约一百多人，被我一连引诱至下麻田附近山地。正当敌人气势凶猛地拉开阵势准备与我大干一场时，一连上百名同志“轰”的一下象麻雀一样四处飞散开，使敌人摸不到、打不着。看着到咀的肥肉吃不成，敌人恨得咬牙切齿，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然往回走。既然是被我们引诱来的，就没那么便宜让敌人回去。敌人刚走没几步，突然只听见“砰砰”两声枪响，队伍里立即倒下两个鬼子。这是我军从西边山头打过来的子弹。待敌人气急败坏地往西跑去时，东边山头又“嗒嗒嗒”一梭子弹朝敌人队伍打去，又有五、六个鬼子中弹身亡。就这样，敌人往东，我西边打；敌人往西，我东边打；敌人往前，我后面打。总之，敌人光知道枪响，人被消灭，就是看不见我们，连半根毫毛也无损于我们。敌人被折腾半天，又恼又怕，只好扔下几十具尸首，抱头鼠窜而去。这次反扫荡行动，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英勇斗争，致使敌人慑于我全民皆兵的威力，不敢贸然突进，轻举妄动，只扫荡了七天，便草草收场，缩回辽县城内。

四、难忘的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初，日军三十六师团、独立第四、第六混成旅团出动一万多人，对我太

行山区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奔袭行动。从辽县、涉县、黎城分三路同时出发，企图以闪电式战术，包围麻田，奇袭我八路军总部。敌人在这次扫荡中还出动了飞机配合。但由于我总部事先得到情报，提前转移到十字岭一带。我警卫团在下麻田附近阻击敌人，掩护总部转移。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我们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走走停停，停停打打，牵着敌人鼻子从一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最后只好灰溜溜滚回城里。这次反扫荡消灭日军一百多名。

“二月扫荡”失败后，敌人恼羞成怒，五月又纠集三万余兵力从正太、同蒲、平汉等方向，分多路前来合击我八路军总部，进行疯狂报复。敌人这次行动接受以前多次扫荡失败的教训，采取步步蚕食、铁壁合围与远距离撒大网奔袭相结合的战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们一反往常行军习惯，行动诡秘，不走大路走小路，绕过村屯爬山地，宿营在荒山野岭。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而且不生火做饭，专吃干粮，尽量减少停留时间。所以，很快就从四面八方向我总部所在的麻田地区扑来，情况万分危急。

在获悉敌情后的某天晚上，左参谋长把我找去。他说，现在我们的处境很严重，北方局、总部和党校等几千名同志都处在敌人包围之中，这次敌人是拼了老本，企图把我们消灭在太行山上，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但是，这又说明敌人是虚弱的。从整个抗日局面看，我们的外线主力正在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不断取得胜利，迫使敌人采取狗急跳墙的办法，把注意力转移到我后方基地。接着，他详细地向我分析了目前我们被围的情况，并要我告诉警卫团全体指战员同志，不要掉以轻心，要高度重视，认真对付这次敌人的扫荡。谈到警卫团的任务时，他说：“你们一定要尽可能长时间拖住从辽县出动的敌人，掩护总部向十字岭一带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几年的残酷斗争实践证明，我们总部警卫团是经得考验的，我完全相信你们。”最后，左参谋长具体地同我研究了兵力部署方案。

当天下午，我们警卫团开始进入阵地。当时，全团只有六个步兵连，加上一个机枪连和炮兵连，共一千多人。按照左参谋长指示，我们在拐儿镇、王家峪、上、下交漳、桐峪等几个方向拉开阵势迎击来敌。晚上十点左右，三连长彭志海向我报告说：在王家峪南面一座高山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约一百多人。通过电台联络，没有反应。我一听心想，这一带除了我警卫团外，没有任何友邻队伍，很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偵

察小分队，而且是日寇的队伍。因为按往常经验知道，伪军人员没有这个狗胆，敢于钻到八路军的眼皮底下。我立即打电话向左参谋长汇报，他指示说：“立即派出小分队搜查一下，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当夜后半夜，我们小分队抓来了一个反动伪村长，通过审问了解到，不出所料，这支队伍是日寇扫荡挺进支队，专门负责侦察我军情报。同时获悉，辽县日军已经倾巢出动，准备经拐儿镇、上、下交漳和松树坪分三路向麻田奔袭。情况紧急，我决定趁敌人大部队未到达之前先敲掉这股挺进支队。结果，第二天攻了一天，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弹药充足，而且事先有准备，没有攻下来。黄昏以后，这股敌人借夜幕向武军寺、麻田方向流窜而去。我考虑到，敌人带有电台，万一他们发现我总部及北方局行踪，敌人大部队很快会通过电台获悉和掌握我军动向，我军则随时有招到敌人消灭的危险。想到这，我立即打电话报告总部，接电话的是左参谋长，我向他谈了我的建议。记得大概讲了两点：1、这次总部转移要打破常规，不要向南、北艾铺，十字岭等无人山区转移，因为那里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应出其不意转移到榆社县或武乡县的洪水镇、左会村等方向离敌人据点很近的地区，依靠革命群众和老百姓作掩护，在敌人身边隐蔽，反而不会引起敌人注意。2、采取分散隐蔽、化整为零的方法。左参谋长当即回答：“不行了，改变不了，彭总已带着三大部和北方局机关往北艾铺方向去了，现已到了郭家峪。”随后命令我警卫团继续监视敌人，有情况随时报告。这时我才知道左参谋长是最后一个离开麻田。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在桐峪，上、下交漳和王家峪等一线山地修起临时工事，部署好兵力，严阵以待，准备阻击敌人的进攻。一切安排停当后，我这个总部警卫团一团之长，对总部是否能安全转移，总是有点放心不下。翌日拂晓，我带领团骑兵通信排飞速赶到麻田，想当面向左参谋长汇报我们战斗准备情况，并想接应总部往洪水方向转移。到达麻田，左参谋长已追赶队伍去了。我们立即马不停蹄，朝北艾铺方向追去。经郭家峪走到南艾铺和羊角之间的二座山脊上，猛听到山下一阵枪响。由于天未亮，看不清。开始我以为是敌人已深入进来了。心想：糟了，可能总部已被包围！但仔细一听枪声不对，日寇使用的多是歪把子，枪声嗷嗷作响，较沉闷，而此时响的却是乒乒乓乓的汉阳枪。我立即肯定是我们自己人，但不知为什么开枪。下了山，枪声停止。不一会，

果然找到了总部，彭总、左参谋长等人都在场。七六九团团长郑国仲带领一个营跟总部在一起。一问刚才枪响原因，原来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警卫连互相发生误会所致。

彭总他们见了我很高兴，听了我的汇报后，彭总说：“很好嘛，一定要想法最大限度地牵制敌人，杀伤敌人。”接着，左参谋长对我说：“现在形势很紧急，黎城方向敌人已渡过漳河从南面正向我围逼，东南涉县一带的一二九师一部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激战正在进行。估计敌人很快会占领涉县，从东南面向我们包抄过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分散突围，各自为战。罗瑞卿（总政治部主任）和杨立山（总后勤部长）带领一部分同志已分别从东、北方向突围出去了，你立即回去指挥部队战斗，尽量拖住辽县方向来敌，掩护彭总和北方局机关从桐峪方向冲出去。我留在后面负责指挥疏散队伍突围。”末了，左参谋长一再叮嘱我：“要记住，不要死打硬拼，打得赢就打，打不赢立即回头接应彭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临走，我很担心左参谋长的生命安全，对他说：“左参谋长啊，你一定要想法跟彭总一起沿北艾铺突围出来，过两天我来接你们。”

他说：“北方局和党校还有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来指挥突围，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啊！只要彭总能突围出去，我就放心了。”

我说：“万一你……”

他打断我的话平静地说：“不要为我担心，现在也考虑不了那么多啦！干革命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大家，个人牺牲了也值得。去吧！时间不等人，情况紧急！”我含泪告别了左参谋长。

赶回王家峪时，部队已和敌人交上火了。敌人为了围剿我总部，不惜血本，利用炮火轮番轰炸我各山头阵地，并组织多次冲锋，但均遭到我警卫团和当地武装民兵的英勇抗击。拐儿岭和王家峪的战斗尤其剧烈。阵地上空，硝烟迷蒙，连太阳也失去了光彩。战斗进行了两天，我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敌人暂时畏缩不前。后来，由于敌人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我被迫撤离阵地。我带领警卫团以最快速度直奔北艾铺，准备接应彭总和左参谋长向桐峪方向突围。快到北艾铺了，在山上却碰见彭总带着总部直属队迎面走来。彭总脸色微黑，心情沉重，其它同志也是个个泪痕满面。我心头一震！一问，果然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敬爱的左参谋长在指挥最后一批同志突围时。

在十字岭被敌人炮弹击中头部，英勇牺牲了。顿时，我似摧肝裂肠，悲愤难言。我强忍住泪水握着彭总，只见他摇摇头，非常惋惜地对我说：“真想不到呀，他还年轻呀！我失去了一位好助手、好战友。”接着彭总问我：“警卫团损失大不大？”我说：“不大。”他说：“不大就好。”然后，彭总果断地做出决定，乘当天夜黑率着我们这几百人马穿过敌人空隙，跳出了包围圈，赶到上、下交漳南面的一座大山（似是水南山）上宿营。为了尽快甩脱敌人，彭总命令我派出侦察分队分头去了解桐峪和麻田方向敌情，以便确定转移路线。侦察结果，桐峪、麻田各驻有日军为一个连。彭总知道后说：“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宜快走为好。”

于是，第二天晚上，根据彭总的指示，我派出一连负责警戒桐峪据点的敌人，桐峪民兵小队队长王滔同志率领全队民兵配合行动，四连开进武军寺，牵制麻田之敌。天刚微黑，彭总便领着我们几百人的队伍绕过桐峪西南面下流的一条山沟，直奔赵姑村。记得夜半十一点接近桐峪镇时，只见镇北山上日本据点的探照灯忽明忽暗，胡乱扫射，隐隐约约还听见鬼子叽哩咕噜的说话声，大概是在换哨。彭总传话要同志们放轻脚步，不许说话，快步通过封锁线。整整走了一夜，天将拂晓，队伍才到达赵姑村。安顿好队伍后，彭总曾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发了电报。内容大概是：伯承、小平：我和总部及北方局部分人员已安全到达赵姑村，但多数同志尚在突围中，左权同志已牺牲，真真不胜悲切。你们处境如何，急盼电悉。刘伯承、邓小平马上回了电，大意是：我师目前在长治一带活动，估计敌人扫荡将要结束，我们准备返回原地（即河北涉县）等等。

在赵姑村，彭总还召集大伙开过一次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唐诗来比喻革命的烈火永远不会熄灭，而且越烧越旺。又把杀人放火、侵略成性的日本鬼子比作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最终必被消灭，被赶出中国。那次讲话，对当时严重受挫的我们，确实鼓舞很大，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第二天晚上，彭总命令我带领三个连返回北艾铺一带接应和收拢突围失散在山里的同志。这时，已风闻敌人开始撤退回城的消息。我临走前，彭总特别交待我：第一、尽快找到左权参谋长的遗体，并负责掩埋好，记住地点，以便日后重新安葬。第二、迅速

打扫好战场，把牺牲的同志集中掩埋，伤病员集中治理，所收拾到的遗失物品集中管理。

我带着部队以及辽县专员公署的同志和总部卫生队赶到十字岭脚下时，敌人已经完全撤退了。第一天，我们在岭脚下一条沟沟里很快找到了左参谋长的遗体，上面盖着青草，当时不知是谁给匆忙盖上的。他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扑在他身边，大概是想上前掩护首长而同时中弹的。卫生队队长宋一珍同两名医生含泪把左参谋长的遗体擦洗干净，换上崭新的灰布军服。然后，我们庄重地把一面红旗覆盖在遗体上，抬上岭顶掩埋好。当时来不及立石碑，只立了个木牌做记号。

接着，我们一边着手清理战场，挖坑掩埋牺牲的战友，一边派人四处喊话，寻找躲在山里失散的同志。开始，他们都没有出来，恐防有诈。后来，我们用吹号的办法，召唤他们。这办法真灵，号音一响，没半天功夫，人们便陆陆续续从草丛、岩洞、山沟里三三两两走出来了。觉悟学员比较多，不少人因为饿得浑身无力，是爬着出来的。有的饿昏过去了，由别人背着走。危难中见到亲人、战友来解救，许多同志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这些失散获救的人员，至今我记得的有：一二九师后勤部部长（名字已忘，后叛变投敌），辽县专员公署一个副主任（名字已忘），还有个女同志是沁源县县委书记（其爱人是该县县委书记），他们都是来党校学习的。大约前后七天时间，我们一共接应和收拢了六、七百人。回来途中，与撤回辽县的日军在东、西黄漳遭遇，双方无心恋战，只互相打了一阵枪。

彭总在赵站村大约只住了三、四天，便转移到王家峪，正好与我们会合。后驻砖壁，不久总部即迁回麻田镇。

五、进驻松树坪

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结束后，警卫团开到武乡洪水整训了大约半年。翌年初，即移防辽县松树坪地区。打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直到四五年日本投降前我奉命南下为止。我们在松树坪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担任警戒，掩护当地群众抢收抢种，一方面屯兵生产。几年的共同战斗生活中，我们和松树坪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互相帮助、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当时，正是抗战相持阶段，局势虽稍有缓和，但辽县城里的伪军还会经常窜到附近村庄抢粮抢物，偷鸡摸狗，骚扰群众。松树坪地区的人民群众吃透了这些伪军的苦头，常常一夜之间，十几亩或几十亩地的庄稼全被这帮强盗偷抢一光，人们都气愤地骂城里的伪军为“偷鸡贼”。为了保护当地群众的利益，警卫团曾对这些“偷鸡贼”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打击。一次大约是在四三年三月间。那时冬小麦刚熟，辽县敌人馋涎欲滴，出动了大约三、四百人趁黑夜向千亩川方向偷偷摸来，企图人不知鬼不觉先下手为强。谁知我们事先早已得到消息，有所准备，把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马家拐附近，狠狠揍了敌人一顿。敌人偷鸡不着，反失把米，扔下许多大车和牲口，狼狈逃窜回城。另一次是在四三年夏天。敌人不甘失败，三个月之盾又故伎重演。这次连辽县反动民团也出动了，加上伪军，足有五、六百人。敌人仗着人多，分两路光天化日之下来抢粮食，一路走千亩川，一路到梁峪。兵来将挡。在松树坪民兵区小队的积极配合下，我们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的打法，把这些“刮民”“偷鸡”的乌龟王八打得人仰马翻，哭爹叫娘，还俘虏了好几十名。经过这两次教训以后，敌人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到松树坪逞凶作恶吃便宜来了。

除了掩护群众进行正常劳动生产外，我们还帮助当地民兵区小队进行军事训练，如练站岗放哨、练刺杀、练投弹、埋地雷等。而且，还结合实战需要，进行各种野外训练。短短时间，使民兵队员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我们还不定时地给民兵队员上军事课。内容多是讲游击战术，如地雷战、地道战、伏击战、麻雀战等等。此外，我们还协助地方维持好社会治安，清内奸，抓敌特，并配合区农会、区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搞好各项工作。在我们驻防松树坪区期间，社会局势安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产连年获得好收成，处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军队保护人民，人民关心子弟兵。当时，按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警卫团开垦种植了一百五十多亩土地，主要分布在左会亚口、千亩川、洪水一带，主要种玉米、山药蛋、小米等。开始，我们什么都缺乏，困难不少。群众知道后，纷纷主动前来相助。没有种子，给我们送来；缺乏牲口、农具，宁愿自己耽误农时，先借给我们用；缺少经验，就主动登门手把手教我们，直到我们学会为止。我们又打仗，又劳动，衣服鞋子破得快，大娘们就自动组成缝衣队，专门为我们缝补衣服，做鞋子。年轻

的妇女组成洗衣队，为我们洗衣洗被。我们的同志要是把脏衣收藏起来，他们就下到各班去强行搜查。老大爷则为我们编织挑筐，修理农具等等。在群众的热情帮助和支援下，我们生产的劲头更高了。辽县的自然条件本来就不错，有山有水，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个产粮长庄稼的好地方。经过我们洒下的辛勤汗水，果然到了农作物成熟季节，庄稼地里果实累累，遍地金黄，一片丰收景象。山药蛋长得又圆又大，一个个拱破了地皮，露出小半拉身子来。颗粒饱满的玉米棒子黄的象金梭子，白的象银梭子，配上紫红色的缨须，在枝杆上随风摇曳，非常可爱。阡陌连绵的小麦、谷子，金浪翻滚，一望无边。收获了，晒场上的粮食堆成了山，仓库里塞得满满的，粮囤也垒得高高的。箩筐、缸子也装不下了。梁上檐下，到处挂着一串串、一丛丛的玉米、花椒，红红绿绿黄黄，招人眼目。按照上级要求，每人每年要完成六十元边币的任务，自给半年。而我们警卫团每人每年平均达到一百二十元，大大超过了规定指标。吃着香喷喷的白面馍馍，我们深深知道：是辽县的山山水水哺育了我们，是辽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养活了我们啊。警卫团政委陈志彬深有体会地说：“如果没有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的军队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提起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我不禁想起当年和我朝夕相处的老房东裴大嫂——裴乃秀同志。当时，我们警卫团的团部就驻在她家里，裴大嫂大约三十五、六岁，瘦瘦的身材，显得几分秀气。然而，生活的磨难使她过早地爬上她的眼角、眉梢。她和丈夫赵金珠共养育了一个女娃，三个男娃。同其他劳苦群众一样，她一家六口全凭一双手，靠劳作种地过日子。

贫苦出身的裴大嫂，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她最恨那些侵略成性的日本鬼子，恨那些甘当奴才的伪军汉奸。骂他们是“千刀万剐的狗强盗”、“没有心肝的狗东西”。正因为对敌人恨得深，她对我们八路军怀有异样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当她知道我们就是在黄崖洞保卫战中，以少胜多、威震敌胆的“老欧团”时，对我们更是亲上加亲，婉如一家。她毫无拘束地称我们为“某某同志”，我们亲昵地叫她“裴大嫂”或“裴大姐”。

那时，我们团部加上警卫、通讯班是有二三十人，全住在她家狭小的院子里。她好几间房子都被挤得满满的。战士们整天进进出出、吵吵嚷嚷，实在给她家增添不少麻烦。

烦。可是，裴大嫂对我们真诚相待，毫无怨言。她对我们的一切需求，从来是有求必应，没有二话，总是尽量给我们提供方便。无论是生活上的吃住用穿，还是别的什么要办的要紧事，只要开口或被她探晓，她总是慷慨相助，不计酬谢。我们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次给她送去酬款，都要经过一番周折才能说服她收下。而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却是束手无策。一次，我们一个同志化装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借用他家一件衣服，不慎弄破了，照例给她送价赔偿。钱在双手里推来推去，好半天功夫，就是没有结果。最后，她生气了，板着脸孔责怪说：“你们常说军民一家人，今天怎么跟我认起生来了！以后再这样，我可可不叫你们再叫我大嫂了。”实在没法，往后我们只好乖乖地听由她安排了。

裴大嫂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心热如火，情深似海。平时，不管是谁在什么时辰，执行任务回来，刚进屋，她的一碗热茶马上就给你端到跟前。要是夏天，她马上拿起扇子替你扇凉；冬天，送来火盆子给你烤暖。好几年她都是这样，似乎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记得她煮的一种茶真好喝。先是用刀子把一小根木棍似的东西削成薄片片，泡在水里用火煮沸，待水是浅绿色后，加进些许茶叶即可饮用。这种茶，喝起来有一股特别的馨香，生津止渴，沁入心肺。据说，这种茶是当地专门用来招待贵客的。裴大嫂经常为我们沏这种茶喝，足见她对于弟兄的一番心意，当地出产一种小糯米，一颗颗象小珍珠。烧成饭，蒸上腊肉，香喷可口。而用来酿成甜酒，就更使人馋涎欲滴，香醇甘美，浓郁醉人。这种甜酒，也是裴大娘经常让我们经常尝到的饮料。她酿的甜酒，独具风味，外加几个酸楂枣，甜味中带点果酸，使你喝起来酣畅淋漓，既过足了酒瘾，又解了渴，却又不伤头脸。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我亲身领受过裴大嫂的关怀照顾。那年，我的胃病发作很厉害，疼得好一阵子吃不下东西，吃了就吐，只能喝些稀粥。她看到警卫员同志天天起早给我熬粥，很辛苦，而且还要忙别的事务，累得熬粥时直打瞌睡，就悄悄地把熬稀饭的活揽过来，并且不让警卫员告诉我。为了长守秘密，每天三顿，她提前把粥做好，先送给警卫员，再端来给我吃。她从警卫员那里知道我爱吃用猪油熬的稀饭，而根据地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肉类方面的供给较紧张，她就冒险跑到敌占区买回肥猪肉，熬下油，专门留给我熬粥吃。当她看到我因病吃得少，工作担子又重，一天天消瘦了，心疼

被了。为了给我补充营养，她用自家老母鸡生的鲜蛋，做成热腾腾的鸡蛋刀削面，让我滋补身体。而她的几个孩子，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她一个也舍不得让他们吃。裴大嫂无私无我，一心一意为革命的崇高精神，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多次坚决要给她报酬，她却说：“欧团长同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你们八路军整天在前方为俺老百姓打仗流血牺牲，我这点小事算个啥嘛！”在裴大嫂的精心护理下，我的胃病逐渐有所好转。

一九四五年初，我奉命随队南下，裴大嫂领着全家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了一程又一程。她流着泪对我千叮咛，万叮咛，说：“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回来看看老根据地的人民啊！”可是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机会满足她的愿望。不过，几十年来，我脑海里时常浮现着裴大嫂的音容笑貌，成为鼓舞我勇敢战斗，奋发工作，永远前进的力量。一九八一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我踏上了英雄的左权土地，探望了阔别多年的裴大嫂。她如今已是满头银丝的裴老妈妈了，但身板还挺结实、硬朗，步履稳健，还可以做些轻度体力劳动。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告诉我，她的儿子赵成银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丈夫在一九四九年也病故了，不久，女儿也因病去世了，现在还有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大儿子赵兔成，原在河南日报社工作，现已到古稀之年，退休了。三儿子赵成福就在本县堡则乡邮局工作，他有五个孩子，孩子亦参加了工作。她随三儿子生活，一家三代生活得很好。我凝望着这位身历沧桑的老大嫂，由衷地祝愿她老人家永远幸福。

另外，顺便稍提一下。当时，警卫团团部参谋邹昌茂，由于工作关系，结识了梁峪村一个搞妇女工作的姑娘曹莲鱼，终于产生了爱情，结为终身伴侣，曾在当地传扬一时。邹昌茂现在吉林省延边军分区，据说已离休；曹莲鱼还健在。一营教导员邓家辉（我南下后任警卫团政委），当年也是在梁峪择偶成的亲，女方名字已忘，邓在前几年已经病逝。两对美好姻缘，也是当年军民关系的一段美好的插曲。

六、忆左奎元同志

抗战时期，在晋东南漳河两岸广阔的土地上，曾活跃过一支英雄的民兵武装队伍——辽县游击队（后正式改名为辽县民兵独立营），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就是左奎元同志。“左奎元”这三个字，当时在辽县、武乡一带可说是家喻户晓，名扬遐迩。

我是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战斗中认识他的。他率领辽县游击队配合我们警卫团行动，作战勇敢，机智灵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在频繁的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合作的机会不断多起来，对他也就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了解。记得当时他二十七、八岁，高个子，黑脸膛，身体粗壮，性格豪爽。然而一双常爱沉思的眼睛，又说明了他思想的成熟。通过和他长时间的接触，我感到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同志，难得的人才。

上面说过他指挥打仗机智勇敢，一点不假，当时，辽县游击队拨归总部警卫团指挥，每次反扫荡，他总是对我说：“欧团长，让我们县支队打头阵吧！”抢着担负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而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每次我总是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我完全信赖他，确实他每次完成任务也总是使人无可挑剔的呱呱叫。一次，辽县城的敌人奔袭驻在武军寺的八路军总部，大兵阵阵逼来，非常紧急。我命令他率领队伍在隘口前面的山梁迎击和牵制敌人，争取时间掩护总部转移。面对强敌，他毫不畏惧，沉着指挥游击队，与数倍与自己的敌人整整鏖战了几个小时，当敌人攻势越来越猛时，他果断地下令队伍撤出阵地，大胆地猛插进敌后，咬住敌人的尾巴，配合警卫团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又一次，扫荡的敌人妄想围剿辽县县委，他率领辽县游击队孤军深入，巧妙地在东黄漳设伏打击敌人，英勇地掩护了县委安全转移，受到了表扬。

除了打仗，他还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他颇有口才，善于发动和宣传群众，展开工作。这点，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我们部队有很多需要和地方交涉的事情，经他出面办理，一谈就灵，干净利索，毫不含糊拖沓。比如动员地方青年参军，这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是件比较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主要是：一、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村村寨寨女的多、男的少；老人小孩多，青壮年少，因而劳动力更少，参军有后顾之忧。二、有些群众乡土观念较重，担心参加了正规部队会远走高飞，离乡背井。由于这些原因，确实给当时八路军的征兵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针对这些思想实际问题，左奎元同志不怕麻烦，跑东村窜西村，上上下下，大会小会，反复进行动员、做工作，他还亲自寻找个别青年聊家常，促膝谈心。从个人谈到家庭，从家庭扯到社会、国家，谈到当前的抗日战争，然后讲清如何摆正个人、家庭和国家民族的关系，讲清先有国后有家的道理。启发到一定程度，他突然会把话锋一转，用起激将法来，“国家有